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 年度述评
- 学人学术
-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他山之石 / 美国史坛 / 略论德里克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

### 略论德里克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

2006-06-30 邢战国 张静 《历史教学》2005年第10期 点击: 602

#### 略论德里克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

### 略论德里克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

邢战国 张静

(1.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上海200433; 2.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系, 四川南充637002)

《历史教学》2005年第10期

关键字: 中国社会史论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德里克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5)10-0028-05

德里克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 著述颇为丰富; “中国社会史论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是中外学者特别关注的学术课题, 笔者拟就德氏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略作探讨, 以期抛砖引玉。

####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缘起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稳步上升, 历史唯物主义逐渐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五卅运动, 特别是大革命运动凸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重要性,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运用阶级学说来分析中国社会和历史。大革命的突然失败迫使他们反思失败的原因: 一些人认为原因在于革命者对中国社会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并制定了错误的革命策略; 而另一些人则继续坚持革命策略的正确性。尽管认识不同, 但他们都相信正确的革命策略在于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 而且都相信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能够正确分析和解释中国社会的科学理论。他们纷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和解释中国社会以寻找正确的革命策略, “当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在1927年之后转向历史的写作时, 他们并不是作为职业的历史学家, 而是在历史中寻找革命实践问题答案的革命者”。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不同分析和解释引发了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社会史论战起源于1927年统一战线内部因党际与党内的分野而爆发的革命策略冲突” [1] (p. 34)。何干之曾概述“论战”缘起: “为着彻底认清目下的中国社会, 决定我们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追求, 迫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的论战, 正是这种认识过去、现在与追求未来的准备功夫。” 耀1爆 (p. 35)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导致了大革命的兴起, 大革命的失败引发了“中国社会史论战”, 而论战的结果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开始就和革命密不可分。

有关中国革命和社会的分析与解释(史华慈认为, 分析和解释中国社会是“中国社会史论战”最重要的目的之一。Benjamin Schwartz: A Marxist Controversy on China.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3, No, 2(Feb. , 1954), P144. )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 共产国际及苏联领导集团极力促使国共两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 并为国共两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策略。国共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紧张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和破裂迫使苏联领导集团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做出新的分析和解释。就此问题，共产国际及苏联领导集团出现了分歧和争论，结果进一步导致了共产国际及苏联领导集团分裂为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这个分歧、争论以及分裂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相应的重大影响，先是就中国革命和社会的认识问题发生分歧和争论，接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派”成员被开除出党。中国共产党和“托派”各自继承了他们在苏联渊源派别的观点并加以发挥和演绎。中国共产党重申中国社会的封建或半封建性，重申土地革命(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坚持反帝反封建革命策略的正确性。“托派”从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共同控制的事实出发，得出中国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准资本主义国家的结论，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区分，事实上也难以区分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左派”(陶希圣是其代表)仍然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中国革命和社会。他们强调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模糊性，肯定中国的主导力量是封建势力，但又认为封建势力早已成为封建残余而且寄生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中。基于以上分析，国民党“左派”主张政治革命(针对上层建筑领域的封建势力)，而反对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或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托派”以及国民党“左派”构成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三个基本派别。他们都坚信历史唯物主义是分析中国革命及社会的有效工具，但他们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同的分析和解释，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德氏认为他们共同的缺陷是“让一些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凌驾于另一些前提之一——而历史唯物主义恰恰不允许这样选择性的使用”[1](p. 68)。

### 陶希圣与中国封建社会问题的论战

正如德氏所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从对中国革命的分析中直接引发出来的，所以封建社会问题成为论战的出发点，并一直居于辩论的中心地位。”[1](p. 78)论战各方对中国帝制时期社会属性的划分有两种基本倾向：一种认为属于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一种认为属于“特殊”社会或“过渡”社会——相应于欧洲封建社会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一个商业社会。分歧和争论的部分原因在于，对商业在中国社会演进中的作用和历史地位认识不同，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对封建社会的定义和理解不同。“托派”强调商业对封建制度的分解作用，认为：由于商业的兴起及其持续性的分解作用，中国的封建制度在东周时期已经趋于衰亡，只是由于中国社会中的某些特殊性，中国历史没有能够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而悬浮于封建社会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过渡阶段。大革命失败后，陶希圣等人(代表国民党“左派”)率先向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公然的质疑，从而挑起了有关中国封建社会问题的大论战，并在论战中一直处于关键地位。陶氏等人将法律——政治视为与经济同等重要的标准来区分封建社会和其他社会形式，他们反复强调经济与政治权力集中在同一集团手中是封建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认为西周时期的封建制度体现了封建主义的全部特征。他们指出：由于商业的发展及其对封建制度的分解作用，东周时期开始出现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分化，社会结构的阶级性因而变得模糊起来。他们对中国帝制时期的基本判断是“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势力还存在着”[1](p. 91)。与陶希圣展开激烈论战的是朱佩我等人(代表中共观点)。朱佩我否认商业资本在中国历史的演变中有什么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从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和“超经济”剥削的定义出发，坚持认为西周以来的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任何质的改变，一直是封建社会。论战各方在解释中国历史时都遇到了特殊的困难——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的历史事实并不吻合，但他们都不愿考虑历史唯物主义的适用度问题。问题是，封建社会是外来概念，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封建社会问题(费正清、史华慈、费维凯、德里克等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不曾有过欧洲意义上的封建社会。John K. Fairbank; Mary C. Wright: Introduc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17, No. 1(Nov. , 1957), P57~58. )。

### 郭沫若与中国奴隶社会问题的论战

郭沫若是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对中国早期文明史的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都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古史辩”派的顾颉刚等人也高度评价郭沫若的史学成就。参阅《革命与历史》，第113~114页。)。郭沫若最先把历史唯物主义所确认的社会演进形式(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序言中所列举的

“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革命与历史》，第115页。)一一拿来运用于中国的历史分期。郭沫若之前的论战各方一般都把西周时期划为封建社会，而郭沫若则惊世骇俗地把西周时期划入了奴隶社会。郭沫若认为，西周封建论的谬误在于学者们把周初的社会制度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混为了一谈，他对支撑西周封建论的“井田制”和“五等五服制”均表示质疑。郭沫若推断，殷及殷代以前是原始氏族社会，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指示的历史发展次序，西周时期必定属于奴隶社会，“周代社会历来以为是封建制度，然与社会进展的程序不合，因在氏族制度崩溃以后，必尚有一个奴隶制度的阶段” [1] (p. 121)。郭沫若没有阐明奴隶社会的确切标准，而是从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的角度加以描述，“冶铁技术的进步及铁器的使用，发达的农业生产和奴隶劳动作为劳动的主导形式，是奴隶制基本的内容” [1] (p. 122)。郭沫若的历史分期主张在1930年之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关中国历史的整体分期问题开始成为论战的中心问题，中国有无奴隶社会问题更成为论战的焦点问题。论战各方对郭氏历史分期思想中的机械主义和公式主义倾向多有批评，“马克思并未认定所有社会形式都是普世的，也并未明言它们一定要按照他所叙述的顺序排列；相反，郭沫若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演化都是同一的这一假定之上”；“郭沫若整个论述都是由他相信奴隶社会必然紧随着原始社会这一‘信念’塑造的” [1] (pp. 127~129)。有些批评者指责郭沫若的论证有问题，“郭沫若推论中最基本的瑕疵就是他‘非此即彼’的处理方法：‘郭君以为……既不是封建制，当然是奴隶制了’” [1] (p. 133)。有趣的是，许多最初反对郭沫若历史分期主张的人，到后来却纷纷赞同他的观点。从三十年代晚期开始，郭沫若的“西周奴隶社会论”基本上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统思想(1978年以后，我国史学界出现了质疑和根本否定中国奴隶社会论的趋势。参阅张广志著《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回顾与反思》[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39~264页。)

#### 有关亚细亚社会问题的论战

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诸多争论的根源所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最先阐发了亚细亚社会问题，他认为亚细亚社会是有别于欧洲社会的另外一种社会类型，产生差异的根源在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在探讨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原因时，一些苏联学者再次提出中国是不同于欧洲社会的亚细亚社会，结果引发了亚细亚社会问题的激烈争论。亚细亚社会论者认为：“中国上起周代氏族社会的崩溃，下至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前，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期，它代表了一个比封建主义更为落后的时期……国家对社会的统治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普遍特征……强大的集权化的国家的作用，塑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的社会政治关系，是中西社会发展歧异的原因。” [1] (pp. 167~158)他们倾向于从地理因素解释亚细亚社会的起源，“农业生产在中国(和其他亚细亚生产方式盛行的地区)高度依赖于水资源的规制……只有具有一个广为延伸的官僚机构的集权化的政府管理才能达到水资源控制的组织要求……在中国的情况下，长存的来自北方游牧部族入侵的威胁要求中原政府持续地保有军事上的准备，这加重了集中权力的组织需要。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政治上层建筑完全控制了社会” [1] (p. 158)。这一观点蕴含着国家对于社会的强势地位使得决定社会经济关系的社会分层的作用变小的意味，这种蕴含意义显然要降低阶级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出于对革命的高度敏感很容易意识到亚细亚社会论的潜在“危害”，他们相当一致地批评和抵制亚细亚社会论，“在论争过程中，苏联学界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亚细亚社会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其他生产方式的变异……1931年之后，这种解释支配了苏联史学界……其后于1938年，斯大林正统史学又将亚细亚生产方式排除于可接受的社会形式之外” [1] (p. 160)。耐人寻味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有关亚细亚社会问题的争论反应相当消极，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社会有特殊之处，倾向于拒绝承认亚细亚社会概念，而更愿意接受苏联正统史学，特别是苏联领导人的有关解释 (Arif Dirlik: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9, No. 3 (Aug. , 1990), P625~627. )。

#### 有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论战

在这个问题上，陶希圣和郭沫若的影响最大，这个问题也是论战中最为众说纷纭的热点问题之一，几乎每个论战者都有自己的分期主张。德氏仔细考察了数十位论战者，列出了详细的表格(表格内容包括37位中外学者的中国历史分期主张以及他们各自的理论来源。参阅《革命与历史》，第187~189页。)。李季是“托派”代表，他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五个主要的阶段，其中殷至殷末划分为亚细亚社会，秦至鸦片战争前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他对上述两个阶段的论述最有创见。王礼锡和胡秋原(《读书杂志》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论坛，王礼锡和胡秋原主持该杂志的编辑事务。)等人严厉批评亚细亚社会论，他们认为中国帝制时期是专制主义社会，其特点是封建主义与商业资本主义的密切结合。专制主义论从经济因素解释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存在，而亚细亚社会论则是从特殊的地理环境特征来揭示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存在。陶希圣认为中西社会形式的性质和发展顺序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发生的变革也基本一致；他的分期观虽然存在不少荒谬之处，但其特色在于“他和王宜昌的历史分期观是唯一不将中国帝制时期视为无差异的整体又能对其做出系统地解释的论述”[1](p. 172)。如前所述，郭沫若最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整体上划分中国历史(具体划分情况为：西周以前为原始社会；西周时期为奴隶社会；春秋以后为封建社会；1840年以后为资本主义社会。和其他论战者一样，郭沫若的中国历史分期也有大的变动和修改。参阅《革命与历史》，第154页。)，除了借鉴马克思的某些历史分期思想之外，郭更多地是运用和发挥恩格斯和摩尔根有关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观点，“他把石器和原始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对应于中国周代之前的时期。金属的发现——以铁为转折点——导致了奴隶社会的出现，大约是在周代商的时期。他对于导致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的技术创新说得没那么清楚，将其笼统地归于冶铁技术的进步。关于资本主义，他援引了马克思的经典论述：‘风车带来的是封建领主，蒸汽机产生的是现代资本主义’”[1](p. 117)。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吸引了论战各方的极大注意力(Albert Feuerwerker: *China's History in Marxian Dres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6, No. 2 (Jan, 1961), P323~353. )，德里克认为，有关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如何把欧洲社会的演变过程有效地套用到中国历史上，为中国历史“配上一个具体的时间表。”[1](p. 202)

###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消退与转向

论战各方各执己见而又意气用事的做法使得“中国社会史论战”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也无望得到解决。1933年之后，论战开始趋于消退，但就一些重要问题的争论断断续续地一直进行到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才不得不终止。在论战出现消退趋势的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了学术化趋向，“1933年之后更具主导性、从长远来看也更有意义的趋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学院化”。其根据是：“首先，它主要由学院中人撰写或是发表在具有学院背景的期刊上；其次，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趋于更为琐细的或是专题性的研究，极少顾及此前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关注的理论问题。”[1](p. 175)德氏将学术化趋向可以细分为三种情况。其一：“由以陶希圣为中心的北京大学的社会经济史家和《食货》半月刊为代表……这一派的史学家们将重点放在历史资料的考证和专题论文的写作上。”[1](pp. 175~176)其二：“有选择地使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其他社会学理论来分析中国历史。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周谷城……他主要是出于启发性而非规范性的目的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并不执迷于理论的问题，而是给予历史证据恰当的关注。”[1](p. 176)其三：“马克思主义学院化的最后一种趋向表现在翦伯赞、范文澜、何干之、吕振羽这几位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学界大名鼎鼎的史学家的著作之中……他们史学解释的共同之处是都采用所谓的五阶段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至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就最适合中国历史的分期模式达成了共识。”[1](p. 177)德里克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结果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没有找到真正一致而有效的历史解释途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形式上达成的某些一致恰恰掩盖了问题的实质，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部充满了张力，为以后的争论和冲突埋下了种子。

德里克认为，论战各方在解释中国历史时都遇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历史不相吻合的严重问题，但他们不是考虑历史唯物主义的适用度问题，而是简化理论以适应历史或者简化历史以适应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把历史唯物主义强加于中国历史的做法使其解释中国历史的成效大打折扣，最终殃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誉。问题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确定无疑地肯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普世性（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普世性问题上存在含混之处，但总的来看他并没有确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适性。他在某些地方（最明显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肯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普世性，但在某些地方（例如《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他又明白无误地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普世性，亚细亚概念暗示马克思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普适性，马克思甚至从欧洲历史的演变中也没有得出确定无疑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马克思极为重视国际贸易对于资本主义兴起的至关重要性。见《革命与历史》，第186~191页。），用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或机械主义等说法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的实质。德氏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系统分析”和“阶级分析”两种分析模式（马克思本人既运用“系统分析”也运用“阶级分析”：《资本论》是前者的典范，《共产党宣言》则是后者的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系统分析”模式较之“阶级分析”模式更具理论价值和效力。参阅《革命与历史》，第200~205页。）。前者从“纯粹的”历史分析的角度出发视社会为一个复杂系统；后者从迫在眉睫的革命视角来观察历史，视阶级斗争为决定历史变革的终极动力。这两种分析模式的追求不同，所以关注也不同，而最终对于历史的结论更不同。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革命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因而特别钟情于“阶级分析”模式，历史唯物主义与革命（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使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普世性坚信不疑（何干之在其1937年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中，表达了对那些否定中国社会特殊性从而挽救中国革命的人的感谢。这表明革命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普世性之间存在紧密关系。参阅《革命与历史》，第193页。）。阶级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普世性问题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坚持阶级斗争的论战方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普世性，他们不认为中国社会和历史有什么特殊性；而反对阶级斗争的论战方（例如国民党“左派”和亚细亚社会论者）则为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辩护，或者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欧洲社会的不同。“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实质性问题在于论战各方的革命倾向不同，而其根源则是论战各方的阶级分析不同，“一些人强调封建残余势力或是国家的力量；而另一些更支持现实革命的人，如李季和拉狄克，则认为尽管帝国时期社会结构确有一定的模糊性，但是无论如何，仍然存在着一定阶级对其他阶级的统治，所以中国社会仍然具有确定无疑的阶级性。在阶级问题上最为强硬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他们不承认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有任何的模糊性，不承认中西之间有任何的变异”[1]（p. 193）。德氏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出于革命的考虑而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对于历史研究唯一有效性的结果“将理论简化为意识形态，使其对理解历史和社会毫无助益”[1]（p. 205）。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确实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德氏以开阔的思路、宽广的视野，特别是以远隔大洋的超脱和冷静客观而全面地考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来龙去脉与详细过程，论战中的各个派别，包括中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国民党“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托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及疏离中共组织但仍然代表中共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朱佩我等人）都在他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尊重。这种整体性关照和全景式扫描体现了德氏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德氏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较之传统的儒家史学范式以及新兴的实证主义史学范式更有优势，其历史性贡献不容置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大问题就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普世性理解和固守。然而其原因何在？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论者大多归咎于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或机械主义，有些论者简单地认为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列文森认为是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张力使然，史华慈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在起作用等。德氏不落俗套另辟新说。他认为革命（或曰政治）才是最主要的原因，而革命的理论根源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模式。

德氏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与我国史学界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在德氏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随意裁剪理论和历史事实等问题。德氏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与我国史学界的看法确有出入。如，他将“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国民党“左派”史学家、“托派”史学家和中共史学家相提并论

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否妥当，值得考虑。德氏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例如，对中国大陆学者在1949年之后的相关研究重视不够，引用文献较少。此外，德氏的某些论述存在中西隔膜之处。尽管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德氏的研究仍然值得我国史学界重视。

**【作者简介】**邢战国(1971-)，男，复旦大学历史系2003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理论等。

张静(1971-)，女，西华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王公恣】**

**参考文献：**

[1](美)德里克著、翁贺凯译. 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1919~1937[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 — — — —  
1 2 3 4 5 6 7 8 9 10